

目 录

忆父亲张雪岩·····	张麟书 (1 — 6)
邓锡侯轶事·····	潘近仁 (6 — 9)
忆学长于厚生·····	郭受祺 (9 — 12)
方勉耕之死·····	刘致中 (13 — 14)
一次发人深省的车祸·····	

李崇莼 冯家骥 李 果回忆

罗 渊 核查整理 (14 — 17)

建国初期的营山川剧团·····	
-----------------	--

谢孟康 王定华 何泽春 (17 — 21)

四十年教师生活的回顾·····	唐建中 (21 — 25)
-----------------	-----------------

我的一段小学校长经历·····	高中乾 (25 — 26)
-----------------	-----------------

骗人的巫覡·····	
------------	--

黄彦彬 何泽春提供资料

王定华 整理 (27 — 29)

县府大院的四棵黄槐树·····	张映斗 (29 — 30)
-----------------	-----------------

营山老陕庙·····	吴怀忠 (31 — 32)
------------	-----------------

忆父亲张雪岩

我父亲张雪岩去世七年多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许多往事，令我难忘。

他为人谦和、正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解放后他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务，但从不以位尊而自傲。在单位里，无论对待年长年少、职位高低的同事，一样尊重，平等待人。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由川北到成都以后，一个星期天，他去坐了一次茶馆，这是老习惯了，在他看来，似乎是自然的事，可是警卫员提意见了，认为这种人多复杂的地方不应该去。他诚恳接受了意见。事后他说，应该替他们着想，他们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在家对待儿女，也从不以父辈自居，对我们的意见，认真地听，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总是耐心地批评指出，从未听到过他的呵斥声。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他。他对待亲戚朋友，无论同辈晚辈，一律平等相待。对他们中间有困难的，在物质上尽其所能给予资助。有位远房亲戚，读书有困难，他每月予以一定补助，使其安心学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家被抄，房屋被人强占，无奈我们被迫迁居。在这极度困难的时候，就是这位亲戚，却写信来责怪他，说他迁走时为什么不将住房让给他，大有兴师问罪之势。当时我对这位亲戚的这种作法，非常气愤，认为这完全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也太过分了。可我父亲却平静地对我说：“青年人嘛，不懂事，不要计较”。他总替别人想得

多。大概是一九五三年，我家原住私房地皮，国家征用，并在洛阳路将拆卸的材料为他另建住房。待房修好后，才发现原来同住多年的一位老住房户尚无住房，为了照顾他们的困难，我父亲硬是将剩余的材料，在花园的空地上为他们修了两间住房。本来这件事，我父亲可以完全不管，但是他想，不能把包袱扔给国家。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自己能够解决的，就不给国家增加困难，同时也解决了住户的困难，何乐而不为。

他在工作中秉公办事，不徇私情，解放后川北行署需要一批懂行的人去工作，由于我父亲对成都情况比较熟，有关方面希望他推荐一些人去工作，而当时向他求职的亲友，却也不乏其人。我父亲一律按行署要求办事，从工作出发，不分亲疏。所以他推荐的人，都能较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他担任川北行署人民法院院长初期，有些人以各种理由为一些犯罪分子求情，他总是婉言谢绝，依法办事。但是他对于那些真正的朋友，正直的人，总是常记心怀，念念不忘。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在一次批判韩文畦的大会上，他的发言，竟然“一分为二”，对韩的为人尚有所肯定。一些人都觉得他太傻为什么不辨风向？我们也认为他的书生气太重了。可他却说：“人总不能昧良心说话，其实我与韩文畦的私交并不深，但他确实是一位正直的人……”。就是这次发言，成了他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重要“罪证”。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自身的处境不妙，但却常常担心着远在北京的何以端同志的安危。当老友郑奠欧同志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即赋诗一首以示悼念：

只今一月无书至，詎料千秋与世辞，

老泪纵横成何用？悔常违约到京师。

题为《哭亡友郑奠欧》。长歌当哭，我等也为之泪下。他在生活上俭朴、淡泊，反对奢侈；思想上，严于律己，要求进步。他对物质要求不高。解放前他也曾作过“官”，当时的职位在一些人眼里，实属肥缺美差，但我父亲却不以为然。比如他曾被委派为县征收局长之职，但从未赴任。作官，不取无义之财，在旧社会实属难得。在他看来，一个人，生不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已属不义，更怎能索取非分之财。所以解放时，身无一文积蓄。平时不注意穿着，不讲究饮食。一件毛哔叽对襟短套衫，穿了几十年，也舍不得换一件。一件涤卡中山装，穿了近二十年，仍然在穿。饮食上对鸡、鱼、肉不感兴趣，对豆制品则有特殊喜好。在生活上，近乎“吝啬”，但却舍得花钱买书，既买马列的著作，也买古书。他好读书，除每天坚持看报外，还阅读其它一些书籍，直到去世，从未间断过。他在思想上总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我修养。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当然感到十分委屈，但又不陷于苦闷之中。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当时他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仍积极参加劳动，并决心在劳动中受到锻炼。他曾写诗一首，

冲天火焰天映红， 午夜几疑日已东；
铁石甘心千百炼， 宝山空自万年丰。

“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抄了，人被抓，衣被无着，但仍能泰然处之。他常说：“身外之物，不留为念，大难不死，余愿足也”。并抄录前人诗以自慰，“常轻身外物，时养性中天；大道难先得，到头自豁然”。足见其心情的豁达乐观。

“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自觉年事已高多注意修身养性，同时也时时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当看到国家被“四人帮”弄得不成样子，工农业凋敝，他们一伙人忙于抢班夺权，而人们却无事可做，他又抄写前人诗一首，对那种怪现象加以嘲讽。诗云：“人道师忙何所为？神仙不怕心劳瘁；可知世上小门徒，终日昏昏打瞌睡。”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国事，初露彩霞时，他又借前人的诗以示心中的喜悦：“哪是真来哪是幻，非真明者莫能辨；我今仍是聋盲人，面对慧灯还自叹。”他始终相信我们的党终有一天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一九七四年寿辰赠友人诗：

秋来神健焕容光， 行坐食眠远胜常；
但惜闲吟新句少， 尤惊好梦多人亡。
友书迟至总疑病， 儿戏腾欢却厌狂；
世运大同征夙愿， 何贪廿载期颐将。

一九七六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接着纠正冤假错案。我父亲被错划右派事，及时得到了纠正，心情舒畅。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即赋诗一首以寄欣慰之情。诗前有一小序：夜梦一老人，导余遨游太空，显示前程之远大，当赋诗数首，觉后仅记一绝如下：

浩然正气夜冲霄， 日月双明足履鳌；
乌云净扫鞋下雨， 齐看我坐九天高。

“我”者，人民大众的一员，这里是“余遨游”，只能用“我”了。既然遨游九天，就不仅看到大陆，也看到南海之滨，台湾岛上的人民。“万里青云路，何时到梦乡？遥望南海岸，垂泪念萱堂”。可惜他没有看到“青云路”已通，

台湾人民的梦想已成为现实。

我父亲青年时期在北大读书时参加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大学毕业回到成都，以同乡关系任职于邓锡侯部，他利用这层关系从事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创办《时事新刊》以宣传抗日，宣传革命。该刊上至总主编，下至一般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总编辑王达非、编辑苏艾吾（即幼农）、彭为和等都是共产党员。社里的日常工作交由王达非负责，报社成立不久，即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注意，并派遣特务暗中监视我家和报社的活动。因此，往往都是夜晚十时以后，王达非才到我家研究工作，以避人耳目。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南门发生群众抢米事件，《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前往采访，即被国民党特务以“煽动群众闹事”为借口，予以杀害。随即查封报社，逮捕了工作人员。幸好事先有所准备，全社主要人员，均已避匿，未遭毒手。我父亲虽有被捕之虞，但又不能丢着善后事宜不管。他冒着危险，四处奔走，一方面妥善安排避匿人员的安全，设法安全转移；另一方面照顾出走人员家属的生活。比如张漾兮（著名进步画家）的爱人及孩子，张走后生活无着，父亲即安排我送去钱粮，以济燃眉。

这时国民党特务更加严密监视我家动向，甚至买通我院同住的一个无知少年，为其递送情报，据说其任务是专门记住出入我家人员的情况。为了减轻压力，我父亲想到只有借助于邓锡侯先生之力了。于是父亲向邓先生谈明了报社的情况及当前处境，希望他予以帮助。开始邓责备我父亲不该办这样的报纸，我父亲说：办这个报纸你事先是知道的，并

且你还资助过。邓听后，似乎很惊诧地问：“真有此事？怎么我记不起来了。”邓说：“好了，我知道了”。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的确曾问过邓：“张雪岩是不是共产党？”邓说：“他那里是共产党，一介书生”。虽然仅此一句话，不仅有利于父亲处理报社的善后事宜，也有利于对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掩护工作。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我家疏散到成都近郊土桥居住，紧连两院，同住的有共产党员杨伯恺和陈传纲、王汝琪夫妇，随之而来的有国民党特务傅谦之、伍英廷等人。在此情况下，为了确保共产党员的安全，我父一方面与傅拉北大同学关系，一方面以邓锡侯机要室主任秘书身份与之周旋，并有意识地让傅等知道，杨伯恺等系父之至交，于私于公让傅不得乱来。就这样，杨伯恺同志等得以安全地度过了几年，直到由土桥回城内。

张 麟 书

邓 锡 侯 轶 事

起义将领邓锡侯，是我的长官，又是我的老师，现就我亲历所知的数则轶事予以忆述，谨表怀念。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初，邓驻节成都，任国民党由二十八军更易番号未久的四十五军军长。他为了集训下级干部，在成都东门外净居寺办了一所军官学校，名曰：“陆军第四十五军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参加受训人员都是

他所属一二五、一二六、一二七、一二八、一三一等五个师的尉级和个别校级军官。一期有三百多人，训练期为六个月。

我当时是该教育团第六期第二中队少尉学员。记得他当时倡导节约，在历次精神讲话中都涉及到有关节约的问题。有：“奢侈可耻，浪费有罪”；“不爱国产品，偏爱舶来品，是存心不顾国本、崇洋媚外的具体表现”等等警句。他本人穿着的戎装，多是草绿色咔叽布。有时也穿阴丹士林布或灰布长衫。

每逢教育团打牙祭（会餐）时，他常亲临饭堂与教官和学员们共同进餐。由于受训学员90%左右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血气方刚，食量自然不小，对于历次会餐中每桌两菜一汤，合计不到三市斤猪肉的牙祭，大家都感到食欲难填！有个别装怪的学员，在菜完饭未完的时候，故意用筷子在镬铁鼓子边敲得铛铛作响。他多次看到那样不景气的场面，总是泰然自若，若无其事。后来有一天会餐中，他看到实在闹得不像样子，便皱着眉头对值星官说：“我要讲话”！当时把很多谨守本分的学员都吓呆了！认为少数害群之马，会连累大家挨臭骂；或要遭到集体处罚！但出乎大家意料以外，他不仅没有生气发怒，反而很风趣的说：“你们当中少数人的怪动作，以为我不懂，那就错了！菜和肉不够吃，这是事实。但要想吃好吃点，又要吃得多，那就应该和肚子商量一下。你们当中有些人不是还要靠薪水养家活口吗？穿衣服我们都晓得量体裁衣，那吃东西也应该懂得量入为出。再讲明白点，就是屠户想吃肉，他也得跟他的本钱商量商量。”当时他连训带讽地说了一大篇，弄得满场啼笑皆非。后来伙食

虽然未变原样，然而食堂秩序却大有好转。

初春的一天，我们全教育团的两个中队，三百余名学员正在操场进行制式训练，他突然乘马来到操场。当总值星官向他报告人数和训练科目后，他说：“我来点点名，认识一下大家。”随即从衣袋里取出花名册和红兰铅笔。于是即由一位中校级的侍从副官唱名，每呼喊一名，他以目光打量一下，便用铅笔在花名册上作个符号。大概是对每个学员的仪表和健康状况有关吧。当侍从副官唱名到学员王漂时，因那个‘漂’字认不得，又不好发问，正在停顿的片刻，他便大声问道“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累字，认啥子？”队长杨月渔站在队伍右翼排头急忙答到：“认罗（漂）！”他点头连说：“啊！啊！”那晓得这时有个站在前列的学员，竟打了一个抿笑。当时被他发觉，便正颜厉色地说道：“笑啥子？认不得就认不得，不懂装懂，那还要得吗？康熙字典有四万多字，那个能认得完？”这几句批评得很中肯的话说完以后，又继续点名。可是，站在队伍头排的中队长便大感羞忿，虎视眈眈地望着那个年轻学员。他当时发觉了这种现象，心中已经有数。在将要离开操场时，息事宁人很委婉地对中队长说：“那个学员年纪轻，不懂事！不必追究他。以后我抽空多看看字典就行了。”

在当年九月邓奉令出川抗日，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先遣队的一二七师一起行动，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抽派连长陈赳桓担负警卫工作。到离太原不远的榆次县境内，便和日本鬼子突然遭遇。身负警卫重任的陈赳桓吓得魂不附体，偏偏倒倒，俨如醉汉一般，还得要勤务兵搀扶，好在一位幕僚人员当机立断命令警卫部队散开还击，掩护总部转

移。于是边打边撤，通过一个壕沟时，不幸马失前蹄，把邓摔下来，腿部负伤。由于当天（十一月六日）大雾弥漫，日寇摸不清我方的底细，打了几十发钢炮就撤退了，这是川军出川抗日首次与日寇接触。虽然战斗时间不过半小时，由于警卫不力，主帅差点儿当了俘虏。

不久，部队转移到江苏汤山集结整训时，有一天他召集陶凯旅全体官兵训话。首先晓以大义，说的大敌当前，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当军人就不要怕死，怕死就莫当军人。后来把话题转到前次在榆次与日寇遭遇战情况，并点名说到：担任军团部警卫连长的陈赳桓，莫得一点军人气概，简直是个怕死鬼！派他来保护我，反而要我们保护他！如果不是军团部人员代他指挥部队，还击搞得快，后果不堪设想了。训话完后，旅长陶凯认为陈赳桓畏敌怕死，只顾自己逃命，不顾统帅安危，罪责难逃，便举起右臂说：“请求军团长枪毙陈赳桓！”他略事沉思之后，慢吞吞地说：枪毙他干啥子？把他调个副职，不要他带兵就行了。我们把他从四川带出来，将来也好一起回去嘛！”这使得当时在场的官兵们深为感动！

潘近仁于乐至县政协

忆学长于厚生

一九三七年在国民党成都军分校我与于厚生同学，一九四九年在川西师管区同于厚生一道起义。一九七五年我任营

山县政协委员，有幸与他爱人刘智先（县政协六、七届委员）、五弟于坤阳（地下党员，离休干部）会见，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现记录下来，并以此文作为对厚生学长的悼念！

于厚生，字坤裕，一九〇六年生于营山县城守镇翠屏村四组，幼时在于家祠堂读“私塾”。年稍长当学徒，为人勤敬。后随族亲陈尔立去成都邓锡侯部当文书，几年后升任排长，由军部保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军分校深造。一九三七年毕业后回到原部当连长。抗战开始，邓部奉令出川抗日时，升任营长的于厚生也随军出川。在山西太原与日寇作战后被调到一一八师（属陈诚指挥）开往上海，布防南翔车站一带。不久，日寇开始向南翔我军进攻，小钢炮、迫击炮、机关枪如雨点般向我阵地倾泻近两小时，工事周围弹痕累累，尘土飞扬，五步以外无法辨物，由于敌众我寡，武器悬殊过大，在完成守卫任务以后，奉令转移昆山一线布防。时隔数日，第二次战斗开始了。日寇先以加农炮、迫击炮轰炸，继以重机枪滥射。这时于厚生胸有成竹地下令誓不还击。日寇误认为我军怯懦易攻，一小分队日寇，全副武装向我阵地大踏步冲来，口中叫喊：“哈七、哈七！”眼见敌人离我百公尺、五十公尺，就在这一瞬间，于厚生一声令下：“开枪！”迫击炮、机关枪、手榴弹、步枪如暴风骤雨般向敌人射去，当场部分日寇中弹死亡，有的则趑趄不前，其余全皆卧下。这时于厚生忽地跃立在战壕上，右臂高举手枪，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呀！”但见刀枪并出，血肉横飞，不到半小时便将敌人整个小分队消灭在我军阵前！真是大快人心！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从一具佩带战刀身着呢军装的鬼子尸体上的证章、军帽、证件上，辨别出官阶是小分队长，名

叫津井五郎，上装包内还有他的照片。除枪支弹药上缴外，对这些来之不易的战利品，都交勤务兵收管起来。战斗结束后，于厚生奉令率该营在阳名山一线布防。大约过了一周多时间，敌人开始大规模地疯狂报复性进攻。日寇动用了飞机、大炮、重机枪、加农炮对我阵地轮番轰炸，将我多数阵地摧毁，我军遭到严重伤亡，于营仅剩下不到两连，物资损失难以估计。营地附近昆山湖内大批逃难的难民遭扫射，船只被炸沉，岸上的民房被炸毁，地面成了一片焦土，尸体遍地，血水成沟，驻营地周围堆码成山的慰问品，均被炸成稀泥滥浆。于营坚守阳名山两处高地中隔一段水田，此阵地毗邻昆山湖，日寇空中有飞机，湖上有汽艇，陆上有大炮加小钢炮、加农炮、重机枪，天上、地下、水中几方向我倾泻钢铁，隔断了两地联系，电话线被炸断，通信兵牺牲，阵地射手死亡，于厚生耳被震聋，潜卧水田中，他机智勇敢地匍匐前进，俟隙跃上对面山堡，趁夜整编队伍，准备与敌再战，午夜，炊事班将饭菜和一桶好酒送上阵地，官兵狂饮饱餐一顿。并面对战地的死难官兵以酒作奠悼慰忠魂！誓报仇雪恨！于营坚守到次日上午十时奉令将阵地移防给后援部队。于营经过三次残酷战斗，牺牲重大，全营官兵剩下不到一连，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但敌人并未夺得我一寸土地。经休整后调苏州吴县补充。这时，于厚生才将所缴获日寇津井五郎分队的太阳旗一面、战刀一把、军帽一顶、尚有血迹的黄呢军服一套，邮寄回老家四川营山县向全县父老报捷。营山县政府当时曾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战斗中县人于厚生在上海消灭日寇，大获胜利的事迹，并将于营所缴获的战利品举办了展览，激发全县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在吴县休整补充后，于营又继续战斗在太湖边上。后调徽州，于厚生升任副团长兼徽州城防司令官。这一带当时处在两军对垒交战的真空地带，土匪、日特、汉奸横行无忌，逃难的老百姓被抢劫，妇女被强奸，未逃的遭到焚烧蹂躏。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城防司令部果断处施，逮捕、镇压了数百名敌特、土匪、汉奸，安定了临战前线该防区的秩序。接着日寇步步深入，攻我徽州、杭州，于部奉令增援，后又投入肖山、衢州、衡阳、独山之战。

日寇投降后，于厚生调国防部作参谋，随卢司长赴滇缅路接收美军接济物资。国府迁都南京，于调国防部四厅任上校参谋，住南京成贤街五十四号。解放战争时期，于与同乡旧友何以端同志（中共地下党员）过从甚密，何经常乘三轮车来，入夜再更车离去，以摆脱特务注意。于当时主管部分重要机密文件，如兵种、军种、部队调动、物资、武器配发等文件。有时带回家中赶办，何以端随手翻阅或便问情况，于亦无所避讳，未作拒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开国大会，为作策反工作，由何以端出钱，邀于坤阳、顾××（何以端的爱人）、杨少柯等作陪，用于厚生名义宴请营山出席南京国大代表李铁樵、同乡寇升垓和方镇华（当时是邓锡侯驻京代表），从上层人士中搞统战工作。在这一段时间，何以端曾从于厚生处搜集到不少重要情报，交由吴克坚转送我党中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于厚生奉令前往邛崃团管区司令部接收新兵时，率该补充团起义，后调成都学习，复员回到老家营山，一九六〇年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四岁。一九八五年，营山县人民政府为于厚生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

郭 受 祺

方勉耕之死

方勉耕，四川忠县人，大学文化。一九四九年八月，以青年党成员、罗广文部政工人员的双重关系，来营山接替县长职务。方到任后，曾扣押盗卖军粮五千石的前民政科长郑导淮和盗卖步枪十箱的前收发主任颜鹏良。他任内组织“营山县清剿地区指挥部”，镇压共产党。十二月初，中共地下党员喻维庭托唐绍虞、李少雄去争取他和平解放营山，稳定社会秩序，方执迷不悟，未获结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风闻人民解放军即将入城，方惊恐万状，率女儿及其亲信民政科长陈干卿、秘书刘××和警察二中队（队长唐帮杰）向仁和（今法堂乡）方向逃遁（详见文史资料十一辑《仁和歼敌目睹记》），后辗转逃往成都。

方到蓉后，成都已解放，成立了军管会，广大市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这时方勉耕愁肠百结，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写了“伪县长方勉耕寓所”一个单条贴在门前，军管会发觉召讯后，开给路条，叫他回营山县办理移交。

一九五〇年一月，方回到营山，住县府后楼（原朗池上面），一排三间，方居中，当时从“革大”分来的青年段炼、王明荣、王乾荣、陈会德分住左右二间，早晚照护，除

“三、二一”扇子匪暴动那天限制他的活动自由外，其余时间活动是自由的。解委会李煜生问他：“为啥子要逃跑？”他说：“当时我主要是不了解党的政策，又未见到《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

方在这段时间写了营山县政府机构及人员组成、公物移交清册，去公安局办了伪人员登记手续。但对“十人团”的活动及他和“十人团”的关系、青年党在营山的发展分布情况、特别是县政府铜质大印的去向（据方讲：逃跑时随身带走，当晚掉在仁和附近的水田里。但经查找和鸣锣悬赏均无下落）等问题反复交代不清，终日愁眉苦脸，忧郁困惑。

同年四月的一天，碑垭口农民唐××在团包岭溪水中（今水电物质供应站左侧）发现淹死一人，传入城中，经检验才知方勉耕畏罪跳水自杀。原税捐处长杨敬荃买了香蜡纸烛去现场祭奠。县人民政府令城守镇公所处理后事。代理镇长余祖勋指定高中乾直接经手办理，用白布裹尸，以五十万元（旧人民币）买付棺材葬于物资局仓库后（现传染科右侧），五月于墓前立碑：“营山县长方勉耕之墓”，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死年五十左右。

刘 致 中

一次发人深省的车祸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左右，在营山济川乡不远的石垭口公路边，一辆装石灰又搭人的汽车肚朝天翻在

水田里，有两人被石灰烧伤致死。肇事者不是一位持有驾驶执照的司机，而是当时营山县副县长李果昌。

出事当天，在营山水泥厂（厂址在渠县卷洞门）蹲点的李果昌因事要回营山。厂里只有一辆运矿石的老牌“雪福莱”汽车，驾驶员蒲春和到重庆买零件去了。李果昌便贸然指定不是正式驾驶员的罗昌元（共产党员）当驾驶、学徒工陈绪荣当助手，装上两吨半石灰开往营山。出发时罗昌元驾驶，李果昌和陈绪荣一同坐进驾驶室，厂里一名请假回家的工人文直卿爬坐在装着石灰的车厢上。

车开到渠县城时，营山县交通运输指挥部安全检查组的刘国裔（人称刘长人，营山造船厂厂长）、胡官国（黄渡航管站站长）、罗志伟（地区派来协助交通工作的、检查组成员）、官启贤（地区派来的交通安全专职干部、检查组副组长）等（组长李崇英当时在小桥），因回县开会正愁找不到车。刘国裔一见水泥厂的车里坐着李果昌，就将公用自行车一靠，但见周围许多不认识的人，不便明说，就挨近驾驶室将左手悄悄伸出两根指头向李果昌一比，意思是搭两个人。李说：“看，坐不下了！”将头一偏并随目光扫向罗昌元和陈绪荣，意思是驾驶室已有三个人了。刘领会意思后，又用嘴朝车上面一努，意思说坐上面也可以。李说：“装的石灰，呛人的很，又是个老掉牙的家伙，准备吆回城去就往超英机械厂甩（修理）。”刘又恳求说：“唉呀！李县长，不咋的，是地区派来检查安全的同志”。这时李皱了一下眉头，有点为难地正在思索时，刘国裔就忙用眼睛示意罗志伟、官启贤、胡官国从车后面往上爬，最后他也在先爬上去的人帮助下连自行车一同上去了。罗昌元怕纠缠时间过长引出其他

夜长梦多的事来，“嘟！”的一声开起就走。到了营渠大桥时，水泥厂请假步行回营山的刘文平和另一位姓杨的同路人，也在请求方便一下的时候搭上了车。车开到四喜的时候，一则路已较平，二则已到本县境内，驾驶室就换由陈绪荣来掌盘。开到小桥盐厂卸下半吨多石灰，吃过午饭，李果昌抢先打开驾驶室，并坐在掌方向盘的位子上，陈绪荣领会到李果昌要掌盘（李在厂里的时候就学着开过多次），按轮次转的想法只好看罗昌元怎样行事，而罗昌元却主动往助手位子上一坐，并叫陈绪荣和盐厂王家惠厂长都挤进小小的驾驶室，陈绪荣只好侧着身子把着车门贴在边边上，待盐厂另一工人也上车以后，李果昌喇叭一掀开起就走。车到骆市时，县交通科派去组织群运工作的李宗伯（原交通科副科长），看见“刘长人”头上包了一根帕帕儿飘一飘的还招呼他：“老伙计，进城看电影去不去？”李宗伯只苦笑地摇了摇头。开到群管站前，又遇着交通科李果骑自行车回县，“刘长人”又在车上喊：“李科长，来、来、来，来坐李县长开的车，我这暴着子老汉儿（即半老不老的意思）今天算沾了光。”在你帮我拉的谈话中，李果随自行车也就上去了。刚好车尾有一空角角，李果只好蹬起八字脚，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抓住车箱板，还有胡正国也趁机爬上去了。李果昌鸣喇叭地开起继续往前。车开到东升，罗昌元说要加水了，停下来加水的时候，李果昌随即问了一下罗昌元：“我是不是还开？”罗说：“你看嘛！”李说：“好，开就开”。

车到济川石埡口，冷不防前面来了一辆架架车，李心里着了慌，主动往边上一让，但让的过多，闯在路边一堆土肥包包上，车一跳，方向盘搬不动了，心里更慌，就使劲一搬，